

赵汀阳
著

The Making
and Becoming
of China:
its way of historicity

專此中國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惠此中國

The Making
and Becoming
of China:
its way of historicity

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國

赵汀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 赵汀阳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086-6136-0

I. ①惠… II. ①赵… III. ①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083788 号

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著 者：赵汀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6 字 数：8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6136-0

定 价：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本书试图对中国的历史性给出一个哲学解释。中国的精神世界乃是经史一体，经史互为表里，离史无以言经，离经无以述史。因此，以哲学的方法论去思考何为中国，必涉及众多相关知识，涉及思想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考古学、甲骨文、古文献、民族学等诸多问题，在这些方面，得到了李泽厚先生、裘锡圭先生、黄平、张宇燕、杨念群、许宏、张文江、李零、吕祥、关凯等诸位师友的帮助。特向诸位师友致谢。

另外，我要向苏秉琦先生致敬。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概念不仅是对新石器时期的中国文明状态的

传神描述，也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解释模型，我将其作为思考中国的一个问题起点。许宏先生提出的“最早的中国”概念是另一个问题起点，尽管“最早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形成过程，未必有一个如同始发站的确然起点，但“最早的中国”的概念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凝聚力起点仍然富有意义。我在本书中论证了一个“中国漩涡”的解释模型，用于解释商周以来至清朝的古代中国的生长方式，上接“满天星斗”之远古中国阶段而止于 1840 年（或者 1900 年）即将转型进入现代游戏的王朝暮年，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古代中国如何形成一个具有难以拒绝的诱惑且一旦加入就难以脱身的博弈游戏，谓之“漩涡”，以及中国如何在漩涡中以“变在”存在论而创造了作为方法论的中国。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王斌先生、李楠女士和王文婷女士，他们为此书的出版尽心尽力。同时我也要感谢赵涛先生、何菊玲女士和王星女士，他们所在的杂志分别发表过此书的部分内容。艺术家邱志杰特为本书封面书写了“惠此中国”，我也要感谢他的高情厚谊。

惠此中国

《惠此中国》以及《天下的当代性》的相关课题研究都得到了凯风基金会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赵汀阳

2016年3月12日

前 言

目 录

前 言	// VII
-----	--------

引 言 述史以祭祖	// 001
-----------	--------

第一章 旋涡模式	019
----------	-----

第二章 内含天下的中国	051
-------------	-----

第三章 逐鹿游戏与中原的诱惑	091
----------------	-----

第四章 方法与命运	135
-----------	-----

述史以祭祖

如果一个文明的历史具有属于自身的生长线索和内在动力，或者说，具有把抽象的时间变成具体的历史的自觉意识、自主能力和创造模式，这种历史就具有“历史性”（historicity）¹，非常接近中国历史观念中关于历史

1 历史性是源于德国和法国的历史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后来成为历史哲学和历史学的一个通用概念。各家的理解和解释基本相通而略有不同。我在这里对历史性的解释，既包含德法对历史性的一般理解，也加入中国思路的相关理解。

变化之“道”与“势”的概念，因此可以说，历史为文明运作之“事”，历史性为一种文明之“道”所内含之“势”。任何一个文明的历史性都表现为三个基本问题：何以如此？何以自立？又将如何？高更有一幅名画的题目表达了与此同构的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又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之间构成互相解释，其实可以合成一个存在论与历史哲学合一的问题：一种存在是如何被创作的？这意味着，对于具有自觉意识的存在（人类社会和文明）而言，存在不再是如其所是（as it is）的自然存在，而是具有历史性的历史存在，于是，“存在”（to be）的问题转换为等价于“因作而在”（to be made to be）的问题。“作”就是去创造一种“存在”的历史，也就是使一种存在成为不可还原（irreducible）为一般存在概念的历史性存在。

历史叙事总是一种主观解释，这一点几乎不可避免。除非完全排除其中的人文意义而写成类似自然史或动物史的叙事，可是那样的话又对人类历史的历史性无所说明，也就对生活意义毫无说明，绝非我们试图理解的历

史。然而，历史解释不是私人趣味，而是共同命运的证词，因此，历史叙事的主观性必须被限制在一种具有客观约束的分析框架中。这意味着，历史解释必须选择（或者默认）一种哲学。不可怀疑的原则在于先验性，可是，历史性直接就拒绝了先验性。这是一个难题，甚至是一个悖论，但幸亏不是逻辑悖论，因此并非无解。维特根斯坦讲过，哲学解决问题无非就像给瓶中苍蝇指出逃离瓶子的瓶颈出口¹。我试图为历史性找到的瓶颈出口是一种“存在论的约束”。

任何一种存在都不可能拒绝存在本身所蕴涵之意图，可称为存在的本意，即存在本身必然蕴涵的或曰“分析地蕴涵”（*analytically implies*）的存在诉求。分析地蕴涵意味着有一个逻辑标准，即排除任何附加含义而仅仅从x本身的含义推出x所必然蕴涵之性质。当把分析蕴涵用于存在论，我们发现，存在的本意就是“继续存在”，除此

1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 309.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4. 原文为: What is your aim in philosophy? To show the fly the way out of the fly-bottle.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编者注)

无它，因此可以说，存在就是为了永在（to be is to be for good）。尽管任何一个历史性的存在的命运和故事都是偶然的，但都必然追求超越历史性的永在性¹，而所有的偶然故事及其命运都因其永在的诉求而具有意义。

“存在论的约束”要求在理解一种存在的诸多诉求时，以存在的本意为准。当存在论问题被约束为关于人的存在论问题时，存在就落实为做事（to be is to do），无事可做就等于不存在。做事所谋者，必定是利于存在的最大资源或最大利益。经济学和博弈论通常所理解的最大利益指物质利益，物质利益肯定是生存之本，但未能全面表达生活所求。事实上，总有某些精神诉求也同样是必

1 存在追求永在，虽然是存在的内在追求，但在极端情况下则可能出现相反情况，为存在状态的变态，所以就有加缪的论断：“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而其他问题，“诸如世界有三个领域，精神有九种或十二种范畴”，或者“地球或太阳哪一个围绕着另一个转，从根本上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见《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页。）自杀是一个违背存在本意的绝对例外，所以是真正的问题，加缪的洞见可谓深刻。但加缪把它看作是唯一问题却是错误的，因为自杀问题的意义和力度都基于存在问题的意义和力度，或者说，死所以能够成为根本问题，是因为生是根本问题。还是莎士比亚看得周全：生或死，这就是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要需求，即非要不可、宁死不弃的精神生活，因此，利于存在的最大资源应该理解为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两者合取（*conjunction*）的最大值，其中自有两者之间因事制宜、因时而变的比例平衡。

在人类生活中，存在论的约束具体表现为人类行为以理性选择为主导。表面上，喧嚣或变乱事件似乎在历史中最为显眼，因此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非理性行为在创造历史。其实，最利于保证存在的是理性行为，出于存在之本意，人们最可能采取理性行为，事实说明，对人类生活具有长久决定性影响的生产方式、技术发明、制度创建、规则制定、习俗形成都是集体理性选择所致。按托马斯·谢林的说法以及肯·宾默尔（*Ken Binmore*）的解释，那些俗成之事都是人们一致选择所生成的“聚点”（*focal points*）¹。因此，理性行为不是都付笑谈中的故事，而是真正需要理解的历史问题。集体理性选择正是

1 参见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48~51页；*Ken Binmore: Game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58~60.

对历史性的建构，其理性表现为一种行为的可模仿性和可重复性。只有一种行为能够经得起普遍模仿和不断重复，才是能够形成存在方式的行为，或者说，才能形成长存的“人道”。具有可模仿性和可重复性的行为之所以是更为有效的存在方式，就在于此种行为模式不会导致报复（自取其祸），或者说，报复性趋于最小值，因而能够形成稳定连续的历史性¹。

如果一个文明的历史回答不了自身历史性的问题，就意味着，或者其历史缺乏足以解释自身的能力而没有能够形成自身独立的历史性；或者因为无法恢复的历史断裂而失去了历史性；或者其历史一直附属于另一种具有支配力量或更大覆盖能力的历史。显然，一种文明的长存能力在于它自身具有一种难以解构而自足的“存在的秩序”（the order of being，沃格林用词），从而形成自足的历史性。一个自足的存在秩序必定来自一种自身生成的内在动力结构，而使其能够连续不断地

1 关于“普遍模仿”理论，可参见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导论。

运行。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构成中国历史性的内在动力结构？

作为历史之中国与作为地理之中国并不完全重合。在今天称之为中国的这片大地上曾经发生的历史并不完全属于中国的概念，其中在部分时间里发生的某些事情虽属今日中国之地，却不属于中国历史；另一方面，历史上部分时间里的中国地域曾经远大于今日中国之地，部分地域虽已不属于现代中国，却属于中国的历史。于是，在讨论中国概念时难免遇到命名混乱的问题。就今日的现实而言，中国同时是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和一个历史，但在时间上，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作为一个文明的中国与作为一个历史的中国却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逐步形成而最终合一的。究竟是何种力量、何种命运或何种理由使作为国家的中国、作为文明的中国及作为历史的中国凝聚为一个丰厚概念，其中必定有迹可循。

首先需要明确一些概念以及分析框架。许宏提出的

“最早的中国”¹既是一个需要明确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富有意义的问题。近年来关于最早中国的地点有着多个选项与争议，尚无定论，有待更多证据。也许对于考古学来说，地点问题很重要，但对于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而言，最早中国概念的理论意义更为重要，它意味着一个精神上的出发点，至于地理上的地点，只是一个象征。首先我们把“最早的中国”定义为：一个足以识别中国为中国的文明起点。它当然不是中国土地上出现的最早物质文明或技术文明，中国的初步技术文明远至万年前，但初步的技术文明尚未具有标志性的精神世界，因此只能说明某种发生于中国大地上的最早文明，却不足以说明最早的中国概念，因此，最早中国的概念必须具有足以识别之“形”而含有中国生长之“势”，即已经蕴涵了中国的生长倾向。

我愿意借用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概念来说明中

1 就我有限之所知，“最早的中国”这个简洁概念是许宏所提出的，但先前早有许多意思近似的说法或表述。事实上可以说中国之考古学以及历史性一直都在寻找最早的中国。（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编者注）

国概念的形成（完形性非常接近中国的“势”的概念）：中国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存在，在它尚未成熟之时，就已经具备了一些基本精神原则而形成完形之势，尽管仍有开阔的演化余地，但完形之势已经预示了完形的概念。中国形成其“完形性”至少需要达到三个条件的重叠：

（1）中国大地上的万民开始有了共享的历史。共享的历史并不排斥每个族群或每个政治共同体在共享历史之外另有专属于自己的历史，所谓共享历史，是在分叉历史（forking histories）之交汇处由万民共同创作而成的历史，而不是单方面强加于人的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2）共享历史的基础是一个共同参与的博弈游戏，四方之民都对参加这个共同的博弈游戏所可能获得的利益回报感兴趣；（3）这个共同的博弈游戏有着足以保证其连续运行的条件。这三个条件的重叠能够大概预示中国概念的成形。同时，中国文明的“完形性”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的重叠：（1）初步形成一个精神世界的基本原则；（2）这个精神世界成为了共同博弈必争的精神资源；（3）这个精神世界具有开放的共享性，因此足以成为通用资源。如

果不能满足以上条件，中国大地上的万民就不可能凝聚为中国之民，中国大地就不可能成为中国。

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在中国地域上，有着从辽河、蒙古、青海、甘肃到中原和长江流域的众多平行并立的初始文明，大概属于苏秉琦所说的“满天星斗”格局。那是一个复数分叉历史的时代，尚未交汇凝聚为一个共享的历史。那时各地文明之间虽有交流互动，但尚未形成一个共同参与的政治游戏，也就尚未整合为一种共同的政治秩序。关键在于，在形成一个共同的博弈游戏之前，断不可能形成一个共享的历史或共同的政治秩序，也就是说，仅有文化、信息和技术的交流互动并不足以形成共享的历史和共同的政治，因为文化交流不是文化合流的充分条件。真正形成文明核心而生成向心力的中国历史大概从夏商周之“三代”文明开始——中原何以成为万民所向的核心文明系统，正是需要解释的关键问题。许宏把二里头看作是“最早的中国”，这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象征性起点，二里头很可能初步形成了中国概念的“完形性”（有待更多